

五大发展理念具有世界意义

张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五大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深入研究和持续热议。这充分说明,五大发展理念不但是引领实现我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有重大作用的重大理念,具有鲜明的世界意义。

一

我国先哲讲道:“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晋书》有云:“人心所归,惟道与义。”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同样也是解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道”与“义”。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作了《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的发言,将创新等理念展示于二十国领导人和世界人民面前,核心意蕴就是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开出良方,贡献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我们不妨放开视野,把五大发展理念置于破解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中来思考和认识。

创新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党提出的创新理念,旨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一部近现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以正确价值观为指导的创新史。18世纪英国率先完成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支撑着英国经济结构变革和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在寻找破解之策,结果还是创新解决燃眉之急,促使资本主义渡过了危机难关。一些拉美国家长期摆脱不了“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受到体制机制的桎梏,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成果乏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8年来,为什么世界经济恢复缓慢、增长脆弱,追根溯源,是因为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一言以蔽之就是创新乏力。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困局,根本动力在于创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强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德国积极实施高科技战略计划——“工业4.0”,旨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变革激发创新活力,通过科技进步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形成经济发展新优势。

协调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协调发展理念,主要是破解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不协调问题,形成平衡结构,增强发展整体性。在当今世界

上,发展不协调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是明显的。正是洞察这一时代性的经济规律,“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才更有力量。中国正在促进“一路一带”沿线国家协调发展,正是协调思维、合作思维和共赢思维的具体表现。

绿色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梦想。既要促进经济中高速发展,又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坚定走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从我国的角度强调绿色发展理念,也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现实短板的深刻认识。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是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在当今世界,只要具有一定长远眼光,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企业不赞同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

开放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开放理念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和认识现实矛盾作出的重大决策。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奉行孤立主义,实行严格的关税制度和贸易壁垒,这被公认为后来大萧条、大危机的一大诱因。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发达国家固于一己之私利,悄然关上了国门,以为这样会度过危机。须知,在世界经济深度互动的新阶段,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离不开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格局,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

共享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民期盼。让人民享受发展带来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无论实行何种国体国家的一致追求。据报道,2015年全球净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共有1330万人。但我们更应看到,全球更有8亿人还在挨饿。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并未惠及全体人民。为了让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各国领导人共同通过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指出,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这充分反映了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强烈盼望。

二

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形成有利于世界各国发挥各自优势的发展新格局,这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全球治理关键在于发展治理,核心在于理念引领。纵观世界大势,五大发展理念将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

第一,积极利用外交舞台传播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多边、双边外交,不断向世界宣示当代中国发展新理念。面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把2016年G20峰会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并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进行峰会筹备工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外交应当把传播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既促进我国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和与时俱进,又致力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增添新的内涵;继续充分利用多边、双边外交渠道和主场外交优势,根据我国外交的总体方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与世界各国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划体系制定和完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促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坚定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

护主义。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主渠道地位,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这是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国情世情深刻变化,着眼开创我国对外开放新局面作出的重大部署。2013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成为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9955亿美元,占全国贸易总额的25.1%。当前,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划体系制定和完善责无旁贷。首先,要把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核心价值和一条红线贯穿各个方面。其次,在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中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让经贸伙伴国和当地人民也能感受到五大发展理念带来的美好前景,切实体会五大发展理念的力量所在。再次,大力造就专业化、复合型、高素质的掌握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人才队伍,并积极向有关国际经贸组织推荐。

第三,积极发挥智库和论坛的独特作用。智库因其对新思想、新政策、新事物感知的敏锐性和研究的深入性,以及与国外政商机构、智库组织联系的顺畅性,使之成为认识、解读、传播五大发展理念的独特力量;而论坛特别是国际性论坛,具有探讨性、交流性和影响力大的特殊优势。通过智库和论坛传播五大发展理念,可以增强主题性、话语权、舆论场和软实力,收到良好功效。要搞好统筹协调,强化顶层设计,各个智库和论坛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智库和论坛要根据自身职能和优势,明确向外传播的主题和重点;要踊跃参加相关论坛,善于运用国际性语言阐述五大发展理念,善于通过“中国实践”阐明“中国理念”;要针对五大发展理念的阶段性特征,通过媒体、论坛、讲坛等平台发表文章和演讲,不断阐发五大发展理念新动态和新效果。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向世界传播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是一项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科学规划、建立评估机制,确保各层次、各方面协调一致,攻坚克难。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理论在线

引入负面清单管理 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任胜钢 刘勇

提要:长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优先地位。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在这一过程中,要研究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严格限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准入,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维护长江生态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当前,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各地区对高排放、高污染产业的准入限制不严,导致能源重化工业等污染密集型产业竞相沿江布局,加剧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因此,研究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严格限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准入,对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维护长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现行的产业管理方式已不适应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的现实诉求。

其一,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对环保性禁入条件设置不严,导致污染密集型行业沿江布局较多,环境风险增大。一是长江经济带主要采取产业发展指导目录选择要求产生错误判断,引发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正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重点在于对产业存量的淘汰,而无法对影响环境友好性和资源节约性的产业增量进行严格限制,存在污染产业的淘汰与新增相抵消的情况,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二是某些地区大力引进和发展能源重化工业,给长江生态环境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其二,长江经济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注重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对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产业的市场准入难以起到精准的限制作用,对产业发展的负外部性管理不足。

其三,长江经济带环境监管体系不健全,增大了负面清单管理的引入和实施难度。比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环境监管体系,对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状况掌握不清,难以有效评估沿江产业对生态环境的预期影响;“非禁即入”式的负面清单制度增大了管理者的监管难度,不利于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

(二)

当前,要引入负面清单管理,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

第一,尽快划定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红线,为负面清单编制提供“底线”标准。生态环境保护红线是负面清单制定的依据和标准。建议从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三个层次划定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红线。一是资源利用层次可从资源利用总量和资源利用效率两个方面进行约束,包括土地、水、能源的总量及万元GDP有效利用量等指标;二是环境保护层次可从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放强度两个方面进行约束,包括工业“三废”排放总量、污染物去除量、万元GDP的污染物排放强度等指标;三是生态平衡层次可从生态健康和生态空间两个方面进行约束,包括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生物多样性指数、珍稀物种生存状况等指标。

第二,加快编制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的负面清单,严格限制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是可考虑列出长江经济带限制禁入类产业的负面清单,主要是对电镀、印染、造纸等高能耗和高污染行业严禁准入和向长江中上游转移,明令禁止这类行业中的小微企业的准入,严格限制这类大中型企业的粗放式发展。二是考虑列出长江经济带落后产能类产业的负面清单,主要是对有色、石化、钢铁、建材等行业限制产能盲目扩张,逐步淘汰这类行业中生产工艺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三是考虑列出长江经济带限期整改类产业的负面清单,对于关系国民经济重要命脉和安全的行业,强制要求通过绿色循环工艺改造达到节能环保标准,对于达不到既定工艺标准和环保标准的企业,可依照清单实施退出和淘汰机制。四是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制定差异化的负面清单标准,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产业发展类型、方式、能耗及污染物排放强度,尤其是对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产业准入和开发强度进行严格限制。

第三,加快建立完善的负面清单监管机制。由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对政府的监管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的监管重心由事前监管向全运营流程监管转变。一是加强长江经济带环境风险预警和管控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的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技术平台,及时识别和化解负面清单管理中的环境风险。构建多区域、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提高长江经济带产业环境风险应急协同管理能力。二是建立环境信息的监测和共享机制,加快整合各地区和各部门的环境统计口径,依据主体功能区制定差异化的生态环境监测标准,构建统一的环境数据共享平台,提高负面清单管理的透明度。同时,根据环境监测数据动态调整和优化负面清单项目。三是定期曝光违反负面清单管理的企业,建立企业环保信用档案制度,对失信企业要加大处罚和责任追究力度。通过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严格控制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准入和转移。

(作者单位分别系中南大学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本版编辑 欧阳优

学术经纬

建立金融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

张橙

从现代金融体系建立之初,金融风险就与金融业的发展如影随形。由于市场主体的盈利冲动,以及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导致资金流动性越来越活跃,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金融脆弱性,进而使融资领域中的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在信贷市场上,借款人的高负债经营和银行不恰当的风险控制措施几乎是同时发生,两者的合力容易导致整个信贷市场伴随流动性的活跃,而潜伏着高风险金融状态。建立金融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成为各国必须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现实的金融市场中,信贷市场风险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金融机构过度借贷的冲动和过度竞争,造成资产质量下降,银行业体系的稳健性出现问题,不良资产逐渐上升;二是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和盲目惶恐,流动性过度充裕或者过度紧张,导致金融产品的风险和定价不匹配;三是金融监管行为的扭曲和不规范,对金融主体创新行为的失控,或者对某些新兴金融主体监管缺位;四是金融当局货币政策失误和过度的货币供给,流动性失衡,难以有效的实现政策目标。

信贷市场风险的累积有很多原因,主要还是由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导致的,尤其是流动性风险,对信贷市场风险的影响更直接也更迅速。

随着近年来虚拟经济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与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也表现

出了新特点:金融脱媒不断深化,居民存款分流催生了更多的金融创新,传统的银行信贷与各种类信贷产品竞争加剧,信贷市场脆弱性不断累积。从近年来的市场表现来看,流动性变化一直是我国信贷市场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这一情况在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环境下尤为显著。

其一,流动性的形成和转移是金融市场不可避免的现象。市场上大量存在分散地持有小额、短期的闲置资金的存款人,使得资金流动性相当活跃:银行需要也愿意让渡一部分流动性以换取更高收益。商业银行把社会上零散、小额、短期资金以存款的形式集中起来,这就是吸入流动性的过程。商业银行通过集中小额、短期资金,解决大额、长期资金需求,实现流动性的转移,使当前资金不足的企业获得资金,并在预期的未来收回资金。在整个信贷链条中,商业银行发挥社会流动性蓄水池的作用。

其二,信贷行为对流动性的放大作用在加速。由于流动性的吸入和发放以及融资的发放和偿还是分离的,受到银行盈利冲动和竞争压力的驱使,金融机构利用自身配置流动性方面的自主能力放大配置流动性是一种必然现象。这种加速放大的程度,主要取决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目前,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上,各类金融机构繁多、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需要有意地加强金融业流动性风险防控。

其三,金融多元化创新导致流动性的过度竞争。金融多元化创新对流动性的影响日益显著。包括互联网金融、信托甚至非正规金融中介在内的各类新兴市场主体非常活跃,使大量的信贷行为处于银行体系之外。这种情况导致传统负债成本过高,迫使信贷只能投向相匹配的高风险项目。如果这种竞争过度,就容易导致市场上的流动性很大一部分进入房地产、股市等非实体经济部门,产生流动性空转,不利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健康。

此外,还要重视利率市场化裹挟金融流动性带来资金成本上升的影响。当前,我国银行的盈利仍然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以及存贷规模的扩张,存贷业务以及存贷利差仍然是银行的核心。目前,我国银行业存贷款利率差异化竞争的局面已经形成。由于竞争激烈,近几年,各种信贷、类信贷产品的收益率始终居高不下,而这个成本最终都将转嫁到信贷市场上。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立金融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有以下一些对策建议。

第一,应该强化央行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引导性效应。随着金融多元化进程的推进,各类金融机构持有的资产不断增长,央行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引导银行业经济主体采取与中央银行调控政策相一致的行动,平抑经济波动,缓冲信贷市场脆弱性。

第二,要加强市场监管,提高市场主

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应该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框架,持续完善制度安排,在对流动性管理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管理信贷规模;对于其他从事类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应该注重风险识别和计量能力的提升,对销售渠道和投资渠道的销售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对于近年来非常火爆的P2P平台等新兴金融机构,应该建立更有效的审核准入机制以及动态管理办法,从严约束金融体系的内在风险。

第三,提升金融市场主体的专业能力,特别是对目前日趋活跃的直接融资市场。对于评级部门、机构投资者等活跃主体,应该继续大力加强专业化建设,确保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和信息支持。监管部门也应相应机构进行有效的动态化资质审查。

此外,还要引导大众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特别是类信贷产品中存在着相当多的收益与风险不匹配情况,而投资者通常难以正确认识风险,因此对收益也缺乏合理判断。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金融产品流入市场,进一步冲击了流动性平衡,加剧了市场波动。投资者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只有投资行为回归理性,市场杠杆才能对投资人风险偏好加以甄别,一些风险容忍度较低的投资者也才能比较稳妥地将闲置流动性交付给金融机构。(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